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



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

纪念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江苏省文史资料第 85 辑附录)

江苏省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南京长江路 292 号 邮编 210018)

南京陵东印刷厂印刷(1998 年 10 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字数 407 千字

印数:1500 本

ISSN1003—9473 CN32—1287/K

工本费: 25.00 元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编委会

主任：童 傅

副主任：卜承祖 戴立泉 张宪文

万仁元 刘伯生 吴志明

张关林 任建新

执行编委：徐梁伯 杨振亚 翟国璋

史 明 韩建国 屠 新

程彩霞

审 稿：张宪文 刘晓宁

感谢

江苏省政协
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
中山集团
中山大厦
等单位领导对本会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

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
一九九八年十月

序

张宪文

199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江苏省学术界为缅怀孙中山的革命业绩，由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邀请各地学者，聚会南京，共同研讨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并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它标志着江苏地区的孙中山研究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值得庆贺的。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中国共产党曾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和赞誉。毛泽东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发表了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科学的概括，赞扬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大会上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给了孙中山三个“伟大”的桂冠，这对孙中山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纪念孙中山，应该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我认为孙中山有三个方面，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的，那就是：

第一：为了改造中国，不怕艰难险阻，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精神；

第三：为了革命，为了改造中国，而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

但是，孙中的研究，在1949年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6年后，孙中山的研究活动在史学界开始蓬勃兴起。是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形成孙中学术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时期发表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下、下册)。

毛泽东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成为孙中山学术研究的指导纲领。

此后，自 1957 年至 1965 年，孙中山的研究在国内展开，一方面取得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形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道路等问题上。反映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问题尚不够广泛、深入；另方面，对孙中山的评价上，或多或少地受到 1957 年后批判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过份地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1966 年，打算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全国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委员的纪念筹备委员会。有关城市如南京、广州等，也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人为首的纪念筹备委员会。可是，还没有到 11 月 12 日，刘少奇已经被迫靠边站。各地方领导人也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孙中山诞辰的纪念活动，就在四人帮的破坏下而草草收场。十年“文革”期间，孙中山的研究，也如史学领域的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孙中山像，也是在重大节日才在天安门广场露露面。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由于周恩来的直接干预，才没有被红卫兵敲掉，而移往中山陵安放。

“文革”结束后，基本上是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中山的研究才再次恢复和活跃起来。1981 年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提出了“高举辛亥革命的旗帜，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在 80 年代，孙中山的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广州、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不少学者积极研究孙中山，有关孙中山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这个时期，出版了孙中山的传记、年谱、全集。旧书、旧刊的影印再版亦不少。

1986 年，纪念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在全国形成了孙中山研究的第二次高潮。研究工作全面展开。这时，对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孙中山和各方面关系，孙中山所处的社会环境，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如孙中山思想体系问题，孙中山和清政府、立宪派、

北洋军阀、西方列强的关系等问题。对孙中山同代人的研究，如黄兴、章太炎、宋教仁、朱执信、秋瑾、蔡锷、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孙中山推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所作的贡献，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自 1986 年至 1996 年纪念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的十年间，孙中山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的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

学术交流的范围拓宽了，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台湾、港澳地区的学术交流扩大了。特别是 1990 年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举行的“孙中山与亚洲”学术研讨会，台湾学者第一次以庞大的学者队伍出席大陆举办的史学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讨了孙中山与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关系。

这一时期突出解决了两岸学者在孙中山学术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如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孙中山有没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问题。台湾学者认为，孙中山没有提出三大政策，孙中山只讲“容共”，未讲过“联共”。双方对“联俄”、“扶助农工”未有异议。经过争议研讨，我们认为孙中山的确没有使用过“三大政策”这个词。但是，孙中山有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和政策，却是确定无疑的。孙中山在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已充分地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质及其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所可能发挥的良好作用。孙中山并没有要求中共党员脱离本党或放弃原有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后，针对国民党右翼对共产党员的弹劾书或反对意见，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会均曾重申：“凡是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于何派，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对于加入本党的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1926 年 9 月 13 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讲演时，也曾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所以总

理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1926年北伐前夕，蒋介石对张继说：“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我们说，孙中山的确没有讲过“联共”这个词，但他的理论、政策、行动，无不说明他是联合共产党进行革命。孙中山并没有要“改造”、“溶化”共产党的意思。“党内合作”比“党外合作”，其“联合”的意味更浓。孙中山没有讲过“联共”，也从未讲过“容共”。“容共”这个词，也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开始使用的。“三大政策”这个说法，确是共产党人后来概括的，它最早见之于1926年十、十一月间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件和《黄埔潮》周刊等。我们说过，后人对前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在符合原意的基础上加以高度归纳和概括，这在历史上或现实政治生活中，并不少见，且是正常的。“联共”和“容共”，如果从“联合”的本质上说，没有什么区别。

近年，孙中山研究的“热点”，仍然集中在“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这个课题上。1996年，各地对孙中山的研讨，都不约而同地注重这一主题。孙中山思想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但是，他的现代化思想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他提出的改造中国的方案，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能否走得通？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学术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几十年来成果累累，贡献突出。然而，研究工作并非差不多了，尚须进一步深化。特别需要进一步发扬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目前，广州的学者正在搜集、整理孙中山各方面的资料，编纂大型《孙文全集》，它预示着孙中山的研究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授）

目 录

序.....	张宪文(1)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的近代化设想的特点.....	段云章(1)
孙中山: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奠基人.....	翟国璋(10)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地位	杨振亚(20)
学习西方 超越西方	焦润明 孙克复(30)
略论孙中山的近代国家思想	刘学照(40)
论《中华民国参议院法》	邱远猷(49)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与地缘文化	郭绪印(60)
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别论	郭世佑(71)
论世纪初期革命党人的民族建国主义	萧永宏(82)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中国国情	何振东(87)
论早期社会化对孙中山的影响	陈蕴茜(97)
论孙中山的舆论意识特征.....	闾小波(107)
论孙中山开放型思维的主要特色.....	齐佩芳(115)
论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	吴祖鲲(124)
孙中山与中国政治近代化.....	季 鹏(132)
被疏忽的研究课题《民权初步》.....	徐梁伯(141)
孙中山与中国文官制度近代化.....	经盛鸿(149)
孙中山与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	冯 敏(158)
试论孙中山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化.....	周新国(167)
论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建构.....	王业兴(176)
孙中山经济思想述评.....	任银睦 卓晓燕(186)
论孙中山与中国经济现代化.....	张学恕(195)
儒家经济伦理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建构.....	胡 成(206)
从“平均地权”纲领看孙中山的国情观.....	申晓云(220)

论孙中山利用外资思想的超越特征	张海林	(229)
孙中山利用外资思想与中国经济现代化	方毓宁	(239)
试释孙中山的开放主义	陈晓东	(249)
孙中山与城市近代化建设	谢本书	(258)
孙中山关于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构想	蒋伟新	汤可可(267)
孙中山与边疆现代化	吴福环	李慧荣(276)
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初探	云乃庆	杨朝全(283)
孙中山的铁道建设思想		冯祖贻(292)
孙中山与长江开发		皮明麻(301)
试论孙中山建设东方大港和整治扬子江的构想	刘 刚	(311)
孙中山关于发展轻工业的设想	郭常伯	(319)
孙中山民初金融改革思想	邵之久	(327)
孙中山禁烟理论与实践	孙修福	(334)
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新探	蒋兆年	(343)
孙中山宗教观中的近代政治、文化蕴涵	董丛林	(353)
论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	涂鸣皋	(362)
评孙中山的农民观	刘 平	(371)
孙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设思想	张胜男	(384)
孙中山对旧道德的改造	钟克钊	(391)
论孙中山修明党德的思想	宝成关	(402)
孙中山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陈 辽	(410)
孙中山的出版宣传思想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	陈晓明	吴述隆(419)
孙中山海权思想研究	时 平	(428)
孙中山建立党军的思想与实践	肖春才	孙 力(439)
略论孙中山军事思想的主要贡献	黄绍栋	(447)
孙中山反清统一战思想与实践之探析	季云飞	(454)
孙中山的和平统一观	华 平	(464)

孙中山对中国统一的主张	(台)蒋永敬	(472)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黎 明	(482)
孙中山晚年与中国共产党	肖 鮑	(490)
深厚的友谊 真诚的合作	傅绍昌	(498)
简论中国人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	陈 勤 李 刚	(506)
继承孙中山的宝贵精神遗产	范方镇	(515)
孙中山研究情况简介	杨振亚	(525)
两岸同胞中山情	史 明	(538)
编后记	编 者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的近代化 设想的特点

段云章

孙中山为谋求中国近代化，迫切要求中国人的近代化，他既努力从世界历史发展中找镜鉴，又力图使之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孙中山作为受过西方较完整教育的民主革命家，在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时，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朴素的唯物观，更因其具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基础，而接受了西方进化唯物主义的自然观^①，既承认物质先于人的认识而存在，人对自然的认识和由自然支配变为支配自然有一个过程，即依次出现的物种进化时期，人类进化时期，它是人类逐渐形成和征服自然的时期，他自称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启发，认定“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②这里，孙中山不仅了解了人的原质、形成和发展过程，对自然的作用和时人必须在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中进行竞争，求得人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等道理，而且据此制定了对付列强竞争角逐于中国、迅谋中国人民免遭内外反动势力奴役、为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幸福的纲领和方案。随着孙中山建设计划的恢宏和细密，他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越高，他提出西欧近代人文主义者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相近的命题：“学问为立国根本”，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毕由学问购来”，“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说，

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③。他除了提倡广兴学校、大力培养人才外，还提出要利用外国人材和先进的外国方法^④，以增强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力量。由于近代中国是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谋建设，因此孙中山特别强调“取法乎上”，^⑤以便后来居上。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人文主义者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然后扩及到民族和国家的自由、平等。孙中山因愤于社会、民族不平等，才产生要求改革和革命的思想，他早就认识到：“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故决不能“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终古”，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力图自主”^⑥。否则，“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⑦国这块既遭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又受满清贵族封建专制统治的土地上生长出的自由、平等要求，一开始就具有先图解决国家民族生存权、先求国家民族自由平等的特点。他在早期虽也声讨谴责过清政府“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不让人民与闻世事国事等等^⑧到人们应享受人权的问题。1907年6月，孙中山在河内接见《时报》记者罗德(Jean Rodes)时表示：“我们也要求人权，像法国大革命所作的一样”，但同时强调“目前中国思想和风俗的特性，这个计划将会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⑨。这表明他在此处讲的“人权”和法国的“人权”观念实际上仍有很大差别。就其原文意思看，他是在解释要废除礼仪专制之后说这番话的，显然有其局限范围。1911年12月发表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里也提到“吾见夫人权颓敝者，其民多恭弱，祸害倚伏，无由而绝”^⑩。这里讲的“人权”，是与反专制建民国相联系，与西方“人权”概念亦不全同。他认为“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而无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⑪，即要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国家民族的完全自

由。据此，他强调：“中国人现在所要的是纪律不是自由”^⑫。他解释说：“从事革命，成功而后，匪独公众之福，抑亦私人之利”^⑬。也就是说，个人自由能寓于群体、国家、民族自由之中。关于平等，孙中山早年主张天赋的人人平等，晚年则把平等细分为人为的和天赋的两种，他主张人为的封建等级的不平等应该坚决铲除，因为“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所以发生革命风潮来打不平”。但他反对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天赋平等”论，认为“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个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孙中山这种争取国家人民的自由平等应高于争取个人自由平等，甚至应牺牲后者来实现前者的自由平等观，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上常有的现象，强调过“小己”自由的严复，也认为“小己之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为自存之计”^⑭，提出过“新民”的梁启超也以孟子所得“新子之国”^⑮为目标，后更附从爱国主义，终归置国权于人权之上。

还应该指出，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由“天赋人权，胥属平等”^⑯，订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和人民得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等自由^⑰，到国民党“一大”宣言按照反对或效忠帝国主义、军阀准则而决定是否享有自由及权利^⑱，是孙中山的民权观适应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取得的新进展，而不能因孙中山扬弃了天赋人权观而视作在人权观上的后退。实际上西方早期人权观在欧美各国也按其实际不断地修订补充。

人的近代化，还有一个人与自身的关系，即一个人需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精神，需要自律而不是律于他人，需要自由地开拓和享受、富有竞争向上的热望。孙中山主要地注重唤醒人的政治觉悟，力图唤起人们当家作主的思想和对民族国家投入忠诚和热爱，作出奉献和牺牲，而较少呼唤人们的深层次的伦理觉悟。但如果细

加考察,还是可以看到他注重的政治觉悟里含有不少伦理觉悟的要素。所谓“伦理觉悟”,主要是要冲破以三纲五常为经纬的封建思想罗网,获得人性的解放,其中特别是忠君思想。而孙中山在决志革命之初,就是要推倒封建帝制,创建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他对忠君思想屡加无情的揭露、鞭挞,并为推倒皇帝而奋斗不懈;他反复在文告、演讲、谈话等等当中,不断宣传革命的主义思想来批判和取代“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的儒家教条;他要人们努力研究革命道理,了解并信从他的革命主义,养成革命的道德,共同努力奋斗,来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打不平,创造一个美好幸福的大同世界。作为儒家修身之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因其灌注上述革命精神而焕然全新;希望出现“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并可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实现世界大同^⑩。孙中山还按照民主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并以世界或某些先进国家为例,重新解释了儒家的其他修身教条,如儒家的三达德——“智、仁、勇”(《中庸》),他认为智应包括“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即应通晓卫国卫民的道理和职责,争出死力以卫国家”^⑪。“仁”包括“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⑫。“勇”系指“长技能”、“明生死”,即“须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⑬。即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不过,孙中山谈论上述问题时,虽系关乎自律、人格、精神、自我开拓、开展斗争,强调“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⑭,但几乎都是以服务于国家、民族为目的,比如他讲人格救国,但主要指“充分的团体人格”^⑮,而没有谈到个性解放与个人人格独立,不像西方近代人文精神那样是追求自我的充分自由,然后又之实现于外界。

就文化心态而言,孙中山不仅具有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情怀,并且与救人救国救世以及建设美好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他这又异于西欧人文主义者所倡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纵欲主义。他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为加紧压迫和奴役世界人民而鼓吹的弱肉强食的强盗道德和被压迫人民中不关于国事世情的愚昧自私思想与脱离群体的荒岛孤人思想，提出了要树立扶弱济倾，被压迫人民奋起联合自救、相互支援，共谋建设大同世界的新道德、新情操。他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吁请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为其实现“提供各行各业的人才”；而这一“典范”的树立，又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②。为实现上述崇高理想，孙中山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极力向人们灌输乐观战斗精神，号召和鼓舞人们奋力去争取富裕而公平的未来，“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③特别是1922年6月的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蒙受较前更为惨酷的失败，但他仍告诫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归于最后之努力者，此则文所期望者也”。^④随之即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

二

综上可见，孙中山要铸造近代中国人，是既具有近代欧美人的某些一般特征，又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环境所能铸造的、并适合中国近代化特点的人。这种差异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要求人的解放，主要是解决民主问题，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得以长足发展。而从魏源到孙中山，乃至其后继者，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的先进中国人，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独立问题，即民族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有如恩格斯于1892年所指出的：“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⑤因此先进的近代中国人都因救亡而奋起，并以救亡为主要使命，孙中山就把他的

三民主义称作救国主义。同时他主要是作为政治家，所以他特别重视的是政治觉悟、政治纲领、政治行为和对公德的培养，而对伦理觉悟、人的独立解放包括新文化运动并未给予深切关注。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正面临着紧迫的民族危机，要图国家生存发展，就必须亟图如同“一盘散沙”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联合自救，因而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决不能刻舟救剑，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标准和要求来塑造中国历史。当然，没有人的主动独立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势必影响历史的进程，如何圆满解决个人自由平等和民族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中国实际妥谋补阙之方，毕生致力于谋求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孙中山尚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而把它留给了后继者。

第二，从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看，现实源于传统而又超出传统。以意大利佛罗伦萨为主要西欧文艺复兴策源地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依据新兴资产阶级城市的出现和资产阶级要求摧毁封建教会的思想束缚、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现实，疾呼复兴希腊、罗马曾有过的奴隶制的民主共和与具有探索精神的在当时堪称繁荣的科学文化，实际上是在以古典为师的旗帜下，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创造，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新世界。

孙中山作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与西欧人文主义者在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上有近似心路。他力图在因袭中国优秀传统、规抚欧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有利于改造中国的“新创”，他要塑造的近代中国人，也确有异于旧传统的新人。然而，孙中山面临的是一个既有悠久的光荣的文化传统，又是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礼教、礼治相结合，以伦理为中心的传统。孙中山也批判过伦理，反对过人治，要求人们自觉地当家作主，实现民主，强调科学精神；而且他因长期生活在具有较早较多开放意识的岭南文化、港澳文化和海外文化氛围之中，因而